

〇〇西南研究書系〇〇

SOUTHWEST CHINA STUDY SERIES
YUNNA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PEOPLE'S OUTLOOK OF
LIFE AND DEATH IN
SOUTHWEST CHINA

楊知勇 著



西南民族生死觀

西南民族生死觀

楊知勇 著

主 編：張詩亞

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爲序）：

史 波 徐新建

郭 淨 張俊洪

鄧啓耀 劉小兵

〇〇〇〇雲南教育出版社

(滇)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龙翔史然

封面设计：袁亚雄

西南研究书系

西南民族生死观

杨知勇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60,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精装500)

ISBN 7-5415-0575-7/G·466 平装定价：8.55元

ISBN 7-5415-0576-5/G·467 精装定价：10.9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生与死、生者与死者的精神联系、民族生死观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作者把生死问题置于文化发展的背景上，与宗教、民俗、艺术、哲学和历史相揉，进行综合研究。在生殖崇拜文化的演进轨迹、生与死的自然和谐的信号、民族生死观与家族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视野开阔，论述精深，材料翔实，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可以提供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研究人员、大学文科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欣赏。



Synopsis

An Intensive Study in such Problems as Life-Death, the Spiri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e Influences of Nationalities' Life-Death Outlook up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Life-Death Mystery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Folklore, Art,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gainst the Milieu of Cultural Evolution. Certain Original Views about some Issues—The Evolution Traces of Reproduction Cult, The Natural and Harmonious Signs of Life and Dea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ies' Life-Death Outlook and Familism, and so on. Profound Analyses in a wide field of Vision. Full and Accurate Material. Excellent Illustrations. Academic Content and Extensive Data Worth Reading by Researchers, College students and People in General.

西南研究论（总序）

“后轴心时代”的学术背景

20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出现了一体化与多极化两大趋势既彼此对立又交互影响的新趋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所谓“雅尔塔”格局（“冷战”格局）之后，历史的进程已跨出漫长的“轴心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后轴心时代”。在这时代中，几大地地区性古典文明独占一方的孤立轴心现象已经结束。以往的轴心及其各自的相关区域都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多种影响、多重冲击而碰撞到了一起。地球上任何完全与世隔绝的文化也都将不复存在。一切边缘的、古老神秘的、过去不被纳入“主流历史”的东西都因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断交往以及现代交通手段、传播媒介的日益发展而几乎是一览无遗地袒露在大众面前。每一种文化都同时既成为观察的主体又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并且，随着不同文化间在时空中原有缓冲带的突然消失，误会与偏见、

冲突和危机也日益增多，与和平和发展初衷相悖的不幸事件往往难以避免。于是伴随着20世纪人口膨胀的数次高峰，人类知识系统也发生了多次“爆炸”。在新时代面前，原有的任何一种文明及其所支撑的知识系统都显得单一和不全面了。每一种文明在深化对“自我传统”认识的同时又增加了不得不尽可能理解无数个“他者文化”的负担。在这样一种多边、多向的对话过程中，这种对话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每一次新的接触都为彼此带来了许多新的经验，而每一种新的经验又都可能动摇或刷新以往的整个知识大厦。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作为漫长“轴心时代”中的重要一极，也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轴心时代”的结束使中国抛弃了以华夏为天下中心的历史成见；另一方面，“后轴心时代”的到来又促使其终止了在亚洲东部闭关自守、仅关注在祖宗崇拜式的千年传统内“精耕细作”的长期定式，滋生并不断强化着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和主权国家这样一些全新意识。这样，如何既在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范围内，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一体化与多极化同时并存的世界背景，深入研究并准确把握其内部不同的多种构成，就成了推动当今中国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与否，还关系到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挑战面前真正做到审时度势，返本开新，以不卑不亢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浪潮曾多次颠覆过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传统观念，以往的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有形无形的“欧洲中心论”影响下，开始用反传统的眼光和反传统的术语来审视并描述自己的传统，热衷于中西文化间的“体用”之争，迷恋于笼而统之的“中外比较”。其结果是在极为粗略地勾画了一番中国与西方列强间的某些表面差异

之后，便急匆匆地拿过西方现成理论来对中国的文化任意“宰割”。在这样的潮流下，悠长久远、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代表、以儒道互补为主流的一种单一模式，而其固有的多种声音、多样色彩却遭到了不应遭到的忽略和抹杀。由于过分青睐西方理论，中国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的形象变成了对自马可·波罗直到近代传教士以来的所谓“东方主义”的一种迎合。我们的学术研究既丢失了过去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所奠定的古老传统，同时也失去了真正经世致用、独立阐释的主动权。

最近以来，随着中国大门的再次打开，国际间的对话和交流促使中国学术界重新反思、调整既有的知识模式，出现了一次规模浩大、意义深远的文化研究热潮。其中，对大传统之外的小传统、亚文化以及各种非儒家正统的文化现象的关注、发掘和重估，还有对诸如什么是“历史主流”、什么是“主流历史”等重要概念的认真辨析等等，都为过于沉闷僵滞的学术界注入了许多新的生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活跃气氛中，中国文化中的区域性问题的，即其在空间上的（动态）分布与差异以及长期以来所谓南北、东西之分的历史现象及其现实意义，才开始受到了应有的注意。进入80年代后，中国东、中、西经济格局的划分及其所派生的“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的激烈争论，又使这种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升到了关系着国家重大决策的程度。

“一点四方”的中国结构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其自身内部以某一地区为核心再向东、南、西、北四周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其实是一个

自古以来从未间断的现象。在西起喜马拉雅山脉东至东亚海域、北自内陆草原大漠南达热带岛屿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几千年来尽管也多次出现过不同的文化中心、亚文化中心相互并立或同一个文化中心在历史的演变中时常迁移的情况，但总体上说一直存在着一个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先是从黄河流域再从长江流域）向四周不断扩散、交融的基本倾向。因此要理解今天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要认识其从产生到成熟、从凝聚到播化的过程，就得从中原汉文化的传统空间观念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体现和展开入手，就得回顾和剖析虽在不断变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中国文化的“东、西、南、北、中”这一特殊结构。此结构的特征可以概述为“一点四方”这样4个字，即以中原某地为中心之点，向四周延伸出四个方向；中心点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回归的终点。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山经》（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表明早在两千几百年前这一“一点四方”结构就已载入了史册。《山经》包括《中山经》（为主）、《东山经》（为辅）、《南山经》（为辅）、《西山经》（为辅）、《北山经》（为辅）5个部分。其以山为纲，以方向和道里为经纬，把当时的天下分作了5个部分。在成书时代较晚但其所记之事却更为久远的《史记·夏本纪》中，更是仔细地描绘出了一个以中原“天子之国”为中心再向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以500里、300里、200里依次延伸而划出的若干个等距离层次，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了彼此间不同的地位、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管理方法。^①在这种

^①《史记·夏本纪》：“……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中国赐土姓。”“令天子之国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一点四方”的空间结构作用下，滋生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式的中原汉文化本位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又反过来在世界几大古老文化传统孤立存在的所谓“轴心时代”中，支撑了中原汉文化在东亚大陆的悠久主导地位。

“一点四方”结构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把周围四方称为蛮夷。这在表面上体现了以我划界的傲慢与偏见，而其根本上反映出的却是与中原农耕方式相联系的祖先血亲崇拜及其所产生的某种自信心和排他性。《尔雅》写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注曰：“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这就十分明确地表述了“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的传统观念。

早期“一点四方”结构的中心之点定位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带，即今陕西、山西、河南之间。由此可看出其所受到的“内陆”（四面都是陆地，并且在同一半径内四周地貌大致相当）和“北纬”（阳光由南及北、四季交替分明）等天然因素的内在影响。在这样的地区内产生出阴阳五行学说及其相关配套的四时、五方观念是不足为奇的。此后该结构的中心点长期只在一条大致相同的水平轴线上横向移动也是不难理解的。此外，由这一地区向四周纵深推延出去，遇到的不是浩浩茫茫的海域（东）就是雪域（西），要不就是差异颇大的草域（北）和山区（南）。因此在相对稳定、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眼光中，“四方皆荒”观念的产生似乎也就有其道理了。基于这样的结构，沿袭这样的观念，中原历代史官、学者写下了大量其实并不总是客观、正确的文献，朝廷君主也以此为据作出了一次次事关重大的最高决策。与此同时，这种往往只反映了居于中心地位之一方价值意愿的结构模式，也由于其种种局限而在长期的发展中留下了许多的隐患。

汉朝强盛，其前后共延续了400多年之久：天子在朝，威振四方，使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的结构模式得到了可说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体现。然而汉代之后，中原屡经分裂、冲击，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分治、重心南迁、佛教入土、西学东渐、胡骑“篡位”、满人入关……原有的中心被不断打破，“一点四方”的传统结构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冲击。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陷于僵化的“汉文化中心”史观才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弱点。但只要危机过去，传统又会回复，最终还是会重现“一点四方”的古老格局。这也许是因为在一种“成者王侯败者寇”习惯心态支配下，中原汉文化多次以强者姿态向其周边不断显示出自己的各种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缘故吧。

不过无论如何，面对今日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一点四方”结构以及传统的“汉文化中心”史观也和西方世界的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一样，作为一种“轴心时代”的产物，理应结束其原有的历史使命了。对于数千年来在其基础上所产生的不尽符合实际的传统看法也都应当在新的观念和新的视野中加以扬弃和纠正了。

从西南观到西南学

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地理结构中，“西南”不过是“一点四方”的某种扩展。四方与八卦相配，变为八方。东南为乾，西南为坤，在解释上虽也与天、地相通，但毕竟超不过万教归一、万法归宗的中原“我朝”。故上自《史记》作者司马迁、下迄清代乾嘉学派，无不在其史书、奏折中将“西南”一概视为蛮夷。即便写入正史，也仅是以极略的篇幅列于章末文尾，

且语焉不详，记述含混，居高临下，任意取舍。《史记》中《西南夷列传》一节夹杂在匈奴、东越、南越及一些传奇人物列传之间，其长度还不及一篇《扁鹊仓公列传》。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时中原人士的视野局限，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说亦体现出那种中原之外无以用心的唯我独尊态度。此种态度在对西南各族各地所取的名称上更是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尚书·牧誓》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西南夷。”班固《汉书叙传》则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写道：“南方曰蛮，亦曰西南番。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故皆蛮地。”此外由古而今诸如“平夷”、“镇南”、“镇远”、“西宁”、“武定”之类的地名在西南各地可说是举不胜举。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数千年中，所谓西南既代表一种方向、方位，一个远离中原的区域，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对其知之甚少的异类文化。并且尽管在“一点四方”的传统结构中，对其边外各方态度都基本相同，但由于历史上西北、东北游牧民族周期性掀起的武装侵扰迫使中原早期的文化中心不断向东南迁移——即对看上去更适合于农耕发展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规模开发，相比之下，西南就显得似乎无关紧要，其在史书中出现的频率和被强调的程度也随之越来越微乎其微了。

明清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元代忽必烈由川→滇→黔直包南宋后院的深刻教训使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西南（至少是军事上）的重视。明清两朝在西南的军事屯兵及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揭开了中原开发西南的历史新篇章。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又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推进，先是瓦解了印度并在沿海一带争夺据点，随后又瓜分了东南亚并在东面“改造”日本，威逼大陆，

南面则企望着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入中国腹地的通道。这时，西南就处在了新旧两重压力的困扰之中：原有的内部冲突尚未完满解决，外部闯来的更大挑战又横在了足下。也正是在这种突变的境况中，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才引人注目地一下子突现出来。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迁至西南重镇重庆。“开发大西南”的大政方针首次提了出来。再之后便是50年代的西南“三线建设”和80年代的“西部开发”。西南的地位日益突出，传统的西南观也日益变得陈旧和过时。以往的文献积累在突然改变的新形势下捉襟见肘，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大潮的紧迫需要。于是一种超越过去简单地以“蛮夷之地”统而述之的新型的西南研究应运而生。专家学者突破传统的“一点四方”结构，深入实地考察，进行纵横比较，其中也有不仅就西南论西南，而且还试图从全国大局、亚洲大局和世界大局来分析西南、评价西南，取得了一批开拓性学术成果。但由于起步较晚，过去的历史偏见又深，迄今为止的西南研究还一方面欠缺着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南文化的基本把握和对作为一种连续过程的西南变迁的全面描叙，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观念和方法上的含混，中原汉文化中心的模式和欧洲理论术语的简单套用现象普遍存在，致使不少必要的领域难以开拓出来，不少必要的反思难以深入下去。西南的自身文化特点和历史意义未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而张扬出来，形成一种共识，成为经世致用的精神财富的目标也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如今历史在呼唤西南，西南在呼唤理论。“西南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已到了事关重要的时刻。从传统的“西南观”走向现代的“西南学”已成为西南研究走向成熟的时代标志。当然，这并不是孤立脱节的偶然现象，它同前述当代学术界的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并同此时期对中国文化

内部的“西北研究”、“楚文化研究”、“汉藏关系研究”、“沿海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更为深入的“儒、释、道研究”、“官、士、民研究”、“器物、制度、观念研究”乃至“精、气、神研究”等等可说都是内在呼应、互为补充的。

历史呼唤新学派

西南的特点是什么？这是西南研究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西南”一词首先代表的是某种相对的方向和方位。随着观察主体的改变其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实际中，“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中原汉文化定都长安时，“西南”表示的是秦岭以南、巫山以西的某一片区域；三国鼎立时，蜀定都成都，“西南”又缩小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一小块地区；而在宋室南渡、迁都临安（杭州）后，连古时长安也变为“西安”，此时的“西南”又一下变得无比遥远而广阔了。不过在长期的历史记述中，“西南”概念又有着某些较为稳定统一的含义（比如边地、治外、蛮夷等）。从今天的眼光看，仅就地域而言，其可大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所指。狭义的“西南”相当于如今的川、滇、黔三省，广义的“西南”则又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西部一些地区。此两种划分都既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考虑到了其所指内部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仍然是一种人为眼光和相对的判断。今天的西南研究一方面要兼顾这两种所指的有效含义，另一方面还应跳出二者的同样局限，即只以一个单一的中原角度来看待所要论述的这一地区。“西南”一词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都已隐含了一个视角前提，即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是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西南方、西南部）。但如果我们再

把视野扩大，同样这个“西南”不也正是印支半岛的“东北”和印度次大陆的“近东”吗？并且倘若改变视角，以“西南”自身为圆心，向四周看去，其不同样也有自己的东、南、西、北四方吗？所谓“中原”不过是“西南”自身四方中的一方而已。因此今天的西南研究既要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又不能囿于古人的立场；既要注意“轴心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事实，又还要揭示“后轴心时代”将要出现的客观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西南”一词就不仅是只代表中原汉文化本位一个方向或方位的狭窄概念，而已变成了一个含义更为丰富，所指更为客观的超越单纯区划的新称呼了。换句话说，其完全可以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两江（长江、珠江）之源”这样的中性名称来代替，或者换成古时《华阳国志》所言的“华山之阳（南）”那样的自我称谓。

相对来说，“西南”是一种他称。正如欧洲人把华夏称为“远东”而华夏则自称为“中国”一样，只有将他称和自称摆在一起并且在二者基础上再产生一种新的“第三人称”，我们的认识（无论对华夏还是对西南）才可能更为完整，结论才更为确切。

从中原“他称”角度看，西南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中国文化的边疆地带，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其长期与中原保持着不是治外、羁縻就是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从“自称”角度看，西南也许自远古“元谋人”时代以来就始终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区域。首先，其北面秦岭及大巴山脉的阻隔大大削弱和延缓了自秦统一中原以来汉文化向西南的推进；其东面的巫山山脉和沅水、乌江等重重障碍既隔断了四川盆地与洞庭盆地间的天然关连，又造成了强大的荆楚文化同西南文化的自然分野；武夷山和南岭则缓冲了其同东南“百越”的某种冲突，并使彼此间的文化距离日益拉开。与此同时，西南内部数条与中原相异的南北

流向的大江大河，一方面分隔出了其同境外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自然界限，另一方面又沟通了西南内部的相互联系。此外，若以更为超越的“第三人称”来看，西南可说是处于多重交汇的重要地带，是一个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首先可以看出与其他区域性质不同的“山地文化”在这里发育生长，而又有多种类型的古代民族在这里迁入迁出；其次可发现东亚大陆的农耕文化与西太平洋渔猎文化在这里交汇，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及后来途经该地区的伊斯兰教从这里向东扩散，中原儒家文化又从这里向南继续播化，再次还可看出由于其自身原有的自然宗教等因素的存在，印度佛教在这里演化为中国“西南化”的上座部佛教，中原道家学说在这里滋生出门徒众多、声势浩大的道教组织，而西方基督教则在川、滇、黔边的彝族苗族地区混合出同当地原始崇拜相结合的奇特信仰；至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长期开拓、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及战后亚洲独立国家的出现而在这一地区形成的跨境河流、跨国民族、跨国宗教等现象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更是进一步表明了“西南”的国际意义。

由此看来，对西南特点的把握以及西南研究自身的突破与创新，还取决于方法论方面的拓展和更新。近代以来西南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学者的介入使原有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种更加显著的“他称”眼光和国际对话的性质。国内的研究自“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在昆明诞生以来，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批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学者自觉运用西方传入的现代理论术语，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新兴学科的角度对西南问题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形成了与欧美学者以及东亚的日本学者等不同的中国学派之雏型。许多陌生的领域被开拓出来，以往的陈见受到质疑，西南本身和西南研究同时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和最为突出的关注。然而由

于国内外战争不断爆发以及战后国际间所谓“雅尔塔格局”的形成等诸多原因，正常的国际交往被中断，被视为一国内部的区域性研究也随之搁浅。西南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原有的成果尚未发生效益，刚形成的基础尚未巩固，而进入80年代后一系列新的问题又在国门重开、现代化浪潮猛烈卷入的冲击下不断涌现。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西南研究一方面已不再可能是纯学术的书斋研究而必须充分顾及现实的经世致用问题，但另一方面其已出现了被现实问题牵着鼻子走，丧失自己学术的客观性和严谨性而蜕变为单纯的决策工具的危险。

有鉴于此，重新深入研究西南，研究西南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经济等问题并且反思历来的西南研究本身，就得付出艰巨的劳动，就得深怀入世的激情，就得继承所有的遗产，就得开创新型的学派。

西南研究的新学派不能满足于仅作出“边疆文化”、“待开发地区”这样一些简单笼统的结论，不能停步于对“图腾崇拜”、“发育不良型社会”等外来术语的直接套用，更不应变相为出于猎奇或迎合心理而进行的“文化古董”贩卖。毫无疑问，西南研究的新学派将在扬弃古老的“一点四方”结构的基础上兼容他称、自称与第三人称三种眼光，既为现实的文化对话、文化变迁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尽可能地实现为有助于深入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提供中国西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这一内在目标。

这是一个尝试，一种开端，一次合作和无限的期望。这期望包含在我们的《西南研究书系》之中，更包含在孕育书系的西南大地、西南历史、西南人民的深厚怀抱里。

《西南研究书系》编委会

1991年5月